

Religious Dimension of Carnival:

On the Bakhtin's Theory of Carnival

宋春香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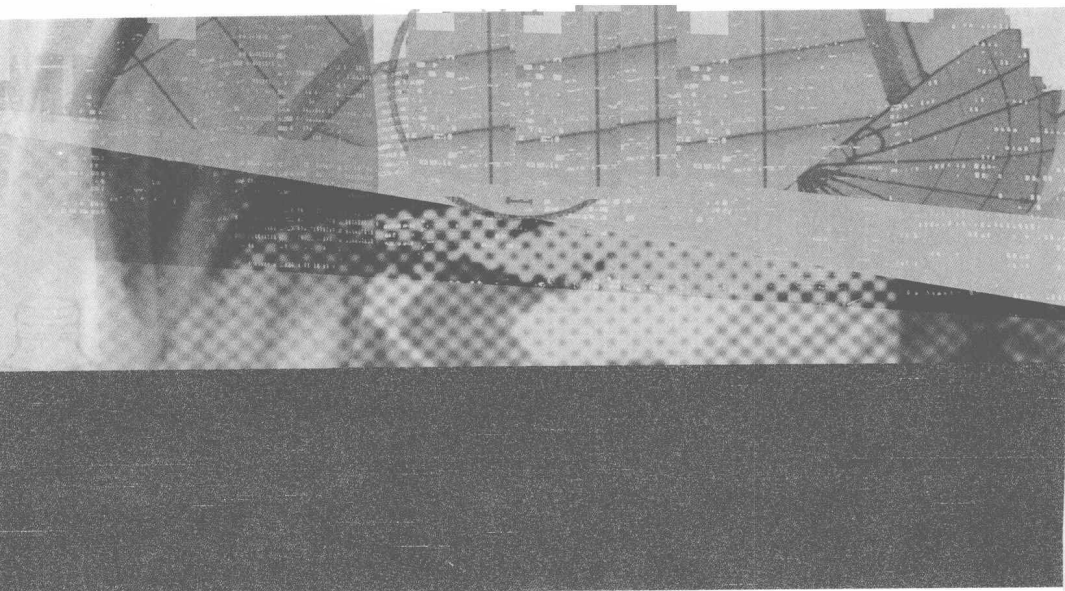


他者文化语境中的 狂欢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igious Dimension
of Carnival:
On the Bakhtin's Theory of Carnival

宋春香 著



他者文化语境中
的狂欢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者文化语境中的狂欢理论 / 宋春香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004-8154-6

I. ①比… II. ①宋… III. ①巴赫金 (1895~1975) — 比较文学 — 理论研究 IV. ①I512.065②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7335 号

策划编辑 冯春风

责任编辑 王 茜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87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多年前，宋春香曾为撰写有关《棱镜的折光——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美学的中国化历程透视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对话走向》的硕士论文从哈尔滨专程来北京找过我。之后，我们曾在 2004 年 6 月于湘潭大学召开的《巴赫金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见过面。会上，她作了题为“巴赫金狂欢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发言。今年夏天，当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送来宋春香的博士论文《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我有一种故人重逢的感觉。尤其是看到这些年来她对巴赫金的研究如此执着、如此勤奋，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感到十分欣慰。尽管我对宗教文化缺乏专门的研究，对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但当她请我为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写点看法时，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

巴赫金是 20 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和文论家。他以“对话”、“狂欢”等思想的深刻性和独创性震撼思想界和文论界。近 20 年，国内巴赫金研究的势头看好，并渐成显学。各种专著和博士论文不断涌现。然而，从宗教文化角度来研究巴赫金思想的论文和专著，却很少见。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一，巴赫金本人虽然是东正教徒，有着浓厚的宗教情结，但当年苏联的意识形态环境十分险恶，他的著作有意回避从宗教角度来论述理论问题。其二，文论和宗教之间的跨学科研究难度很大，需要有多重学科知识的准备，因此很少有人问津。当年我的学生王志耕（现为南

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撰写《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博士论文时就碰到不少难题。当然,最后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并获得好评。于是,在收到宋春香的博士论文时,开始我还有些担心,觉得难度太大。当我看过论文,特别是参加她的论文答辩,听到大家一致肯定她论文具体而深入地阐明了巴赫金狂欢理论和宗教文化的内在联系,并且所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赞扬她的研究体现了青年学者的学术勇气,这时,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论文是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阐明了两者的内在联系。作者先从巴赫金的教徒身份和宗教情结论起,当然,这只是说明两者具有内在关系的一定条件,还无法真正从理论上论证两者存在必然的关系。为了说明狂欢理论和宗教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为了科学地论证二者之间的文化关联问题,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从源头上论述狂欢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又从理论逻辑出发,从文本出发,充分地论述了宗教文化在狂欢理论中的构成,从狂欢中“笑”的宗教意蕴、狂欢身体的宗教意义、狂欢形象和宗教圣贤、狂欢戏仿和宗教文本等方面具体深入地论证了两者的内在联系。这种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狂欢理论和宗教文化的内在关系,是具有理论说服力的。

然而,必须看到狂欢理论和宗教文化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不是表层而是深层的,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我认为论文的成功之处,也就是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作者不回避问题的难点,不把理论问题表层化、简单化,能够充分重视并试图深入地阐明两者复杂的内在联系。首先,作者强调狂欢理论和宗教文化的关系是一种深层的内在关系,两者固然存在差异,但两者的精神诉求是一致的。两者都因为不满现实而追求理想的彼岸、追求人的终极归宿,并从中得到心理解放和精神慰藉。我

认为这才是抓住了狂欢理论和宗教文化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问题。其次，作者注意到了狂欢理论和宗教文化的关系是一种既亲和又对立的复杂关系。在指出宗教文化是狂欢文化的源头和两者精神诉求的一致性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两者在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在话语表达方面的差异性。我认为，两者差异性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狂欢的源头就不只是宗教，这不只是宗教作用的结果，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诸如底层民众生命力的张扬，就充满一种心灵的欢乐和生命的激情。一篇成功的论文，一部成功的著作，不完全在于把问题说得面面俱到、头头是道，而是不回避理论难题，勇于面对问题的复杂性，并深入地辩证地把问题分析清楚。

由于该论文选题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所以必然会存在一些不足，存在一些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但总的来说，该论文是成功的。这是作者勤奋刻苦和认真钻研的成果。同时，也是导师杨慧林教授的指导分不开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院的宗教文化研究在杨慧林教授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也出现了不少与研究宗教文化相关的博士论文。正是这种整体的学术氛围为相关的科研和博士论文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种学术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十分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十分有利于科研和教学发展，是很值得赞赏的。

宋春香还很年轻，将来的道路还很长。其博士论文的写作和出版还仅仅是学术研究的起点，我祝愿她在今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不断取得成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程正民

2008年8月24日

前 言

巴赫金研究在国内早已成为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之一。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理解，这将是一个有很大难度的课题。毕竟，在中国的理论界和创作界，有关巴赫金思想，尤其是对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借鉴和应用，可谓目不暇接。所以一个研究角度的选择很重要，也很难以把握。我选择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视角来认识巴赫金及其思想，只想从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这一侧面，折射出巴赫金思想中不被中国学者关注的另一面。

一 选题缘起与当今的学术背景

巴赫金及其思想就像一个魔方，让人无法摆脱由之而来的理论诱惑。笔者关注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а. 英译人名为：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1895—1975）及其狂欢理论的原因：除了巴赫金本人磁石般的诱人魅力之外，还有狂欢理论自身内容的独特的引人之处。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讲，“巴赫金给对话者留下了一种自由构筑个人思想体系的可能性”^①，在

① А. П. Валицкая, Д. П. Бак, К. Г. Исупов, В. Л. Махлин, О. Е. Осовский поставитель: Проблемы бахтинологии \ Бахтинолог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ереводы публикации,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1995г, с. 1.

多维的审视中,就会出现不同的“巴赫金形象”(Образ Бахтина)^①。由此,“俄国东正教信徒巴赫金,俄国宗教或神秘主义的哲学家巴赫金成了注定要出现的现象”^②。所以,本论文涉猎的宗教,就是其中的一维。而且,很多理论难题会在宗教的诠释和解读中,涣然冰释。

巴赫金作为20世纪的著名思想家,堪称是一位多产的学术专家。其论述可谓涵盖了文学、文化、宗教、美学、哲学等多个人文学科,他的文本也完全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解读。他的坎坷生平 and 卓著成果给人留下的一个鲜明印象就是:始终与时代对话,始终与人的终极诉求对话,始终与人性的原初欲望对话,始终与人的未来对话。在当代的多元学术氛围中,其狂欢理论如鱼得水,不仅行走于西方文论的阐释空间之中,而且吸引了东方学者的学术眼球。狂欢理论作为一个学术文本,其存在方式必将在阐释者那里获得新的意义。正如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 1939—)在引述别人的观点时所讲的那样,文本只是一次“聚餐”会;作者带去语词,而由读者带去意义。^③

所以,本书也试图将“作者意图”、“诠释者意图”、“文本意图”,通过第一手资料、笔者目的和资料证明的方法,做一个合理的融会贯通。尽管理查德·罗蒂讲过,诠释者的作用仅仅是“将文本锤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④。在此,我力求遵循作

① А. П. Валицкая, Д. П. Бак, К. Г. Исупов, В. Л. Махлин, О. Е. Осовский поставитель: Проблемы бахтинологии \ Бахтинолог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ереводы публикации.,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1995г, с. 10.

② Peter Hitchcock, *Interview with David Shepherd*, in Bakhtin/ Bakhtin: Studies in the Archive and Beyond, ed. Peter Hitchcock (Duke University, 1998). 转引自梅兰著:《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③ T. Zvetan. Todorov, " Viaggio nellacritica americana", lettera, 4 (1987), 12.

④ 理查德·罗蒂:《实用主义的影响》(*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第151页。

者与文本的原意，而避免将材料硬性“锤打成”自己的模式。

在当代学术圈内，在部分学者的笔下，狂欢成了后现代的解读话语。诸如狂欢与解构、狂欢与颠覆、狂欢与躯体等等，常常在学者的研究文章中结伴同行。无可厚非，这种研究现象一定程度上是源于既定的学术背景和“西化”话语的影响。这虽然有它生成的现实背景，但与此同时，狂欢古老的宗教基因似乎被研究者无形之中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而不愿拾起。这样，虽使得狂欢具有无限丰富的诠释可能性（possibility），却一定程度上丢弃了理论产生的根源，忽视了该理论源于何处的理论诉求。

实际上，对某一理论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如何系统地理解该理论的意义生成机制。由此，才不会导致学术术语的滥用和误读，亦不会造成不可避免的精神投资和人力资源的浪费。荣格曾解释说，任何神性形象如果我们对其过于熟悉而失去了神秘性的话，我们将不得不转向其他文明中的形象，因为只有具有异国情调的符号才能保持其神秘的气氛。^①我想，这也是笔者选择该论文选题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太有必要将巴赫金及其理论放在“他者”文化（其中，自然包括俄罗斯文化）的镜像中加以映照了。要知道，“整个宇宙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镜子的大厅，任何个体在这里既是被反映的对象，又反映着其他的物体”^②。从中也力求彰显笔者的写作态度：偏爱开放性的意义探索、追求寻根性的理论梳理、敬慕权威性的阐释标杆、推崇永恒性的自我创新、贬抑墨守性的成规定论。

① [意] 安贝托·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 页。

② 同上书，第 33 页。

二 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价值

本项研究致力于考察巴赫金本人的宗教情结和狂欢理论的发生学渊源，在解析狂欢同宗教既亲和又对立的矛盾关系中，进一步明确狂欢理论的意义生成机制和话语方式的宗教性特征，即狂欢如何从一种节日性的文化现象转变为一种文学表达方式，如何从一个“节日庆典”变成了一种“狂欢化文学”，如何从一种“狂欢化文学”演绎升华出了一种文学理论、文化理论，甚至是一种哲学理论，以最终揭示凝结其中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我想，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与文化简单的沟通和交合，更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时代的学术探索。在狂欢理论中，应该有一种内在的东西，“藏于内而显于外”的东西，吸引着巴赫金——包括每一位研究狂欢理论的学者。有人将其概括为“人文科学方法”，如钱中文；有人将其简化为“人文精神”，如程正民。论点之多，不一而足。但笔者认为，这种蕴含在狂欢理论之中的“内在的东西”就是——一种宗教诉求，一种“非宗教的宗教理想”，从而在源头上把握狂欢及其理论的宗教性内涵，从宗教文化的角度对狂欢理论做出新的解读。长期以来，由于受巴赫金狂欢理论追求自由、崇尚平等论述的吸引，学者们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其哲学内涵、文学思想和当代影响层面，而忽视了狂欢理论产生的宗教文化背景和与此相连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宗教精神诉求。缪勒说过：“只知其一，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况且，以宗教视角讨论狂欢理论，就所阅资料来看，涉猎者不多，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系统化的梳理过程可为当代狂欢理论研究注入一点点新鲜血液。最终，从宗教诠释中理性思考并回答狂欢“来自哪里，走向何处”的问题。所以，此

项研究当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狂欢理论。

（二）实践意义

当代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当代中国狂欢理论的研究走向问题。因为，狂欢生活还在当代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延伸，诸如：大众文化、影视节目、文学创作等，随处可见狂欢的影子。对此，我们每一位人文学者不可能无动于衷，它需要我们解决现存的各种文化狂欢现象，哪怕仅仅是理论上的彻悟。创新是当代中国很时髦的一个词，可创新不是对西学的移植和依恋，更不是对传统的延续和重复，而是立足于中国当今的“既定现实”和“既定国情”，提出具有建设性和实践性的理论和思想。本论文的选题正是在关注狂欢文化现象的当代性中做出的一种必然选择。

三 研究的理论特色与创新之处

迄今为止，有关狂欢理论的研究已经是数不胜数了。要想在此方面取得些许成功，并有所收获，其首要的条件就是不断研读前人科研成果，继而有所推进。因为若仅仅满足于既有的解释和研究框架，并且在其间挑选某一个来诉诸笔墨论证何者为最好、何者为最坏的方法，是传统的、陈旧的，更是被动的。重要的是如何主动地去开发新的阐释资源，走近新的研究视角，才有可能有效地避免固步自封的不足。本文试图在追求几个方面的创新：

（一）研究视角

在比较文学与文化的视域中，一国文学与哲学思想的传播与影响，既可以表现为该国整体文化理念的熏染，也可以表现为对某一位思想家的青睐。在俄罗斯文学与哲学的研究中，对巴赫金

思想的关注本身即是后一种表现形式。在中国的巴赫金研究中,尤其是在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研究中,以宗教为视角,并带有强烈问题意识的成果,为数不多。就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看来,仅有两篇文章(复旦大学程金海博士2002年8月发表在《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的《复调理论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宗教意味》、张欣发表在《多边文化研究》上的《“对话”与“狂欢”的宗教哲学背景》)和一篇硕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张欣的《从对话看宗教因素对巴赫金小说理论的影响》)。所以,若仅仅从研究视角而言的话,该文是一篇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从宗教视角全面系统地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学位论文。

(二) 诠释框架

本研究的诠释框架遵循如下原则:狂欢理论首尾贯穿,宗教主线渗透其间;宏观宗教背景起篇,微观论点呼应,具体是:首先论述巴赫金及其狂欢理论的宗教文化背景,其次分成小篇章,步步为营,由点到面地分别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产生渊源、学理基础、理想诉求、宗教反馈等问题,最后总结全篇,由狂欢与宗教的暧昧关系阐发开来,揭示出狂欢由文化现象到文学理论的宗教性因子,将狂欢理论的宗教诉求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宗教史研究中的反馈问题作为本研究的归宿点,以进一步强化狂欢理论的宗教性内涵,在狂欢与宗教的复杂关系中来重新审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

(三) 理论见解

首先,论文对巴赫金狂欢理论的范畴给予了富有宗教文化意味的界定和系统化的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理论要义:提出了宗教是狂欢的文化源头;对话哲学和酒神理论是巴赫金狂欢

理论得以产生的理论渊源；宗教文化历史语境是狂欢理论赖以生成的宏观背景；宗教意识是生命中的狂欢精神上升到理性层面的主体意识的结果；宗教文化主题是狂欢理论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狂欢理论的精髓在于对现实生活的理性反思和对生命意志所进行的感性表达，从而将非宗教信仰的宗教精神普适化、理想化。

其次，论文挖掘出了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明线，即以巴赫金狂欢理论文本体系为依据创建的宗教文化意义和宗教叙事模式；一条是暗线，即西方文化中宗教传统的影响和宗教哲学的理论背景。同时，指出如上两条线索的发展脉络和演化规律，及其交错变异的复杂性特征。

再次，论文对巴赫金所提及的狂欢、狂欢式、狂欢化术语和狂欢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和梳理，并在对尼采的酒神理论和狂欢理论的异同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剖析了蕴涵在巴赫金狂欢理论之中的宗教内涵，并在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新的诠释。

（四）文献材料

只有在充分、翔实、新颖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论文才更有可能得出切中肯綮的研究结论。在本论文中，笔者所引用的材料，尽量做到依托外文原文，而且大部分为 21 世纪的最新版本，有些还是巴赫金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第一手资料，很难寻觅到，异常珍贵。由此，在论文写作的材料积累方面，除却了过时之嫌，最大限度地跟踪国际上巴赫金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四 试图突破的问题和难点

（一）研究资料少

国内关于狂欢理论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从宗教层面来讨论狂欢问题的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关于俄罗斯宗教问题的中译本研

究成果，更是微乎其微。为此，需要积极搜集外文材料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文献。这自然要面对翻译原始资料的重大挑战。如何在引介和翻译外文资料上下功夫，并有所收获是笔者要突破的难题之一。卡勒曾断言，“正如大多数智识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①。

（二）文化差异大

狂欢理论真正的集成地乃是俄罗斯，宗教视角的切入又需有西方基督教和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背景知识，狂欢理论本身又同中世纪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紧密相连，同时，笔者又是以中国学者的身份在探讨狂欢理论。这些都无形中提升了写作者的综合性要求，即要在跨中西文化的时空差异中来研究狂欢。但是，正是由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视角的切入，也极大地丰富了巴赫金狂欢理论阐释的界面，以期在宏大的宗教文化背景下调合进异质文化的多元色调。

五 研究的范围和角度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无任何言辞明确要赞同宗教（基督教），同样，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与上帝的疏离。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就断定，它不能用宗教视角有效地予以诠释和解读。在众多的研究文章中，学者们大赞其理论光环，可这些光环不是生来就照在巴赫金的头上的。其理论是有源头可以追溯的，并非空中楼阁平地起。

“宗教现象是把握社会或文化事实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① [意] 安贝托·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9 页。

(刘小枫)^① 关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若从宗教视角来阅读有如下几种选择：一是把其中描述对象看作是一种文化宗教现象，一种从世俗角度用叙事者的身份和宗教话语来认识的特殊现象。另一种是把狂欢理论自身当作是一个基督教文本，从而把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作一个堕落的话语来读。而我选择的是另外一种方法：即探究狂欢在文化史和宗教史中的宗教性特征，由此来论述巴赫金所建构的狂欢理论的宗教性内涵，既从源头上追索狂欢与宗教的渊源关系，又从理论上考证狂欢同宗教的逻辑关系，尤其侧重于论述狂欢对宗教研究的启发作用和被人忽略了的现实影响。

本论文题目本身就凸现了一种将狂欢同宗教相联结的神学特征。因为“诠释”（interpretation）自然并非 20 世纪文学理论家们所独创。由怎样描述诠释活动的特征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争论与困惑在西方具有很长的历史。这一问题首先是由试图确立“上帝之言”的意义这一极为大胆的想法所引起的。其近代阶段始于 19 世纪初，施莱尔·马赫（Schleier Macher）所建立的圣经诠释学，导致了对“本文的意义”这一问题高度自觉意识的产生；到了 19 世纪末，狄尔泰（Dilthey）便将施氏的神学诠释学进一步推向普遍化和理论化，诠释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理解人类的精神创造物、探讨整个“精神科学”的基础。^② 艾柯在同罗蒂、卡勒有关诠释问题的论辩中，曾求助于一种“文化达尔文主义”的策略。他认为在“历史选择”的过程中，某些解释自身会证明比别的解释更能满足有关读者群的需要。^③ 笔者在此也试图用饱含创新的热情，甚至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

① [美] 汤普逊著、杨德友译：《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之《中译本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

② [意] 安贝托·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 页。

③ 同上。

来系统探求狂欢的宗教之维。也期盼着在历史的选择中获得读者的批评和指责,以求在狂欢理论之中不断有新的“发现”,使得自己的学术研究不断完善完美。更何况,“文本是在诠释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而诠释的有效性又是根据它所建构的东西的最终结果来判断的: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①。

要想切实理解狂欢理论的内在精髓,便不能不把狂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深入而具体地研讨如下种种关系:狂欢与历史、狂欢与文化、狂欢与民族、狂欢与社会、狂欢与政治、狂欢与法律、狂欢与哲学、狂欢与文学、狂欢与艺术等。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宗教学几乎跟所有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相关;反之,所有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几乎都跟宗教学有缘”^②。那么,宗教与狂欢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本论文不是泛泛地谈论宗教,尤其是东正教对巴赫金及其狂欢理论的影响,而是在新的学术高度上,深入地研究狂欢理论的宗教本质,从宗教文化的角度对狂欢理论做出新的研讨和解读。

所以,本论文在写作中采取了史论结合的论证方法,淡化“非历史性角度”^③的神秘主义阐释,力争做到以史带论,以论证史,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文本同宗教现象和宗教文化意义紧密相连,使得宗教阐释能够建立在对理论文本的分析基础之上,有效地避免空洞和教条的不足。同时,本论文力求从狂欢的人性特征和宗教内涵来评价和议论,极力剔除掉巴赫金及其狂欢理论之外的政治环境影响,以便从另一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作为一个通常现象,在许多学者

① [意]安贝托·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② 张志刚:《宗教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③ 梅兰:《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的论述中都有有一些关键部位，这些部位就像矫健的机关一般引发了贯穿他们一生的思考”^①。对于巴赫金而言，宗教正是这样一个可供挖掘的“学术机关”。

当然，这里既不想把巴赫金定位成宗教学家，也不想将狂欢理论说成是神学理论，此论文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狂欢理论的解读提供一条崭新的路径，以更有利于学者对该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以使得大家更加全面和客观地看待巴赫金及其狂欢理论，而不至于各执一词，以偏概全，形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认识局面。

^① 刘华：《矛盾与悖论：巴赫金的〈镜中人〉》，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60页。